

寻找中华文明的味道

——盐业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盐，“百味之首”“国之大宝”，它看似平凡，却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日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介绍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项目，讲述从沿海到内陆，横跨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覆盖海盐与井盐两大食盐生产体系的盐业故事。

完善盐业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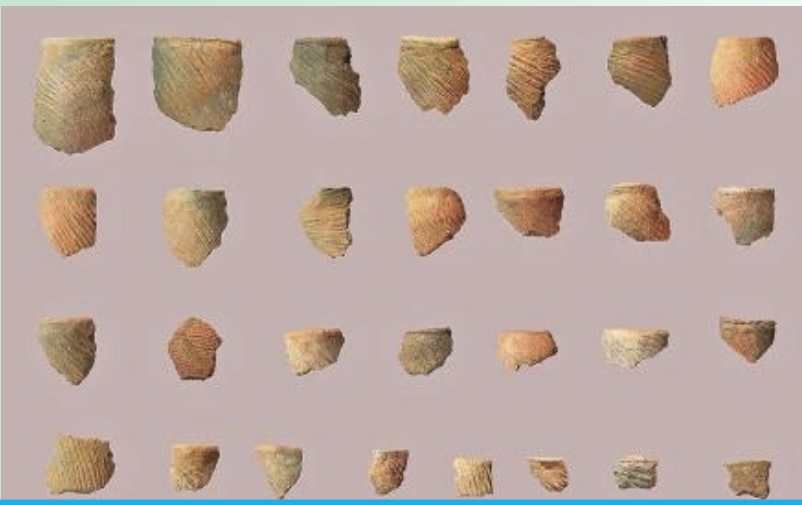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食盐生产主要有4类——海盐、井盐、湖盐、岩盐。本次发布的4项成果，恰好填补了海盐与井盐两大体系的关键空白。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雪非介绍，其中姚家湾遗址所揭示的制盐工艺与盐业发展脉络最为典型，实证了4800年前东海先民煮海为盐的智慧，为探索我国盐业科技发展史找到了新的源头。

汉代制盐“流水线”什么样？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润垦介绍，在连云港时庄遗址内，发现了三条完整制盐生产链：从提取卤水原料到卤水提浓，再到用陶制管道输送卤水到蓄卤坑，最后把卤水上灶煮盐。这种完整的“流水线”证明当时食盐产量和工艺都有明显提升，为研究汉代的制盐工艺和管理制度提供了新资料。此外，沙井头遗址中发现了一批“盐官丞印”“广陵丞印”的封泥及“官”“舍”“库”款的陶文，实证了该区域为汉代盐渎县官署所在地。而这正是汉王朝在全国设立盐官、实行食盐官营的重要实物见证。

在同处东部沿海的山东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串联起商周—南北朝—金元时期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明奎介绍，其中，坡家庄遗址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与古代南方“刮滩淋卤”或“海水煎盐”的模式并存。

除了海盐，井盐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食盐生产方式之一。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的中堡遗址，犹如封存井盐制作工艺的时光胶囊，将延续两千年的井盐生产技术定格下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牛英彬介绍，该遗址发现的战国时期煮盐设施、淋卤设施、制盐器具以及附近的飞水盐井等，共同构成了一处生产要素齐全、遗迹保存较完整的制盐作坊体系，清晰地呈现了先秦时期陶器制盐的工艺流程。而遗址中厚达10余米、连续叠压26层的文化层，分为战国、汉代、宋代和明清四期，与周边的盐业遗址共同构成了始于战国、近现代仍在沿用的制盐技术发展脉络。



找到看不见的「盐」

盐不比陶、玉，遇水即化，盐业遗迹仅凭肉眼往往难以辨认，而科技之“眼”可以帮我们找到看不见的“盐”。

朱雪非介绍，现阶段想有效识别盐业遗迹，一方面是针对土样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针对陶土制品以及残留物的成分进行分析。比如，“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可以在无损的条件下，直接在煎盐盆的内壁、盐灶结构件外侧，以及一些盐泥废弃堆中发现大量钙化物，这是目前反映制盐活动最为有效的指标”。

“多采样、多检测，才能使盐业考古从无形化为有形，把盐的生产、运输、消费等环节看得更清楚。”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青说。

考古学者通过科技手段，复原了一张早期三峡地区和乌江流域的食盐产销图——陶盐模器是解谜的关键。这种器具会随食盐销售流散至各地，因此考古学者同步对三峡地区和乌江流域同期、同类型陶器开展成分和岩相分析，对陶器产地进行溯源，进而勾勒出食盐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流通轨迹。结果显示，战国中晚期，郁山已成为独立产盐中心，食盐主要供应乌江流域，而忠县中坝遗址的食盐则行销于长江干流区域。“两大盐场的销售区域划分清晰，初步勾勒出中国早期食盐产销制度的雏形。”牛英彬说。

盐文明演进催化剂

“盐是生命之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

盐是每人每天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极大，因此它从来不只是“调味品”那么简单。盐业牵涉到资源控制、交换网络、社会组织等深层命题，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更贴近古人日常生活、也更接地气的切入角度。

盐业资源是区域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良渚的兴起离不开盐，而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正好为解答良渚食盐来源提供了线索，也提示我们，未来在杭州湾等浅滩地带，或许还能找到更多相关盐业遗迹。”陈星灿如是说。

“中堡遗址是探究盐资源在巴蜀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关键证据。”牛英彬说。在中堡遗址，我们看到不仅制盐工序有精细化分工，还带动了制陶、燃料供给、运输等配套产业——这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生动缩影。更重要的是，重庆井盐深刻影响了巴蜀文明的兴衰：巴人依托盐业资源积累财富、整合周边势力，最终建立起巴国。文献记载中，郁山盐业资源曾搅动巴、秦、楚三方地缘格局，各方围绕它展开激烈争夺——一把盐，竟曾是区域文明博弈的砝码。（据《光明日报》）

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出土的制盐陶器。

▲这是6月4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海事博物馆拍摄的瓷器杯盘、玻璃残片等文物展品。新华社发

▶6月4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海事博物馆，人们参观“瓷器沉船”文物展。新华社发

本报讯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龙岩市文旅局，固原市委宣传部、固原市文旅广电局联合主办，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承办的“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系列红色文旅交流活动在固原市举办。两地通过思政宣讲、专题巡展、讲解大赛、跨省研学等形式，深化闽宁红色文化交流，活动将持续至11月。

作为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6月26日，两地红色宣讲团先后走进原州区第二十三小学、固原市第二中学，开展红色思政进校园宣讲活动。古田会议纪念馆负责人阐释古田会议历史渊源与时代价值，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和六盘山纪念馆的讲解员依次讲述闽西苏区革命往事、少年英雄张锦辉事迹以及红军翻越六盘山的长征故事，结合闽宁协作生动实践，为在校师生带来沉浸式思政课堂，引导青少年体悟两地一脉相承的红色根脉。

次日，《古田会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专题展览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开展。展览系统展现了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寓意两地革命精神跨越山海、一脉相承。两地文博工作者围绕场馆宣教、研学课程开发等进行座谈，深化馆际合作。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同步启动。赛事面向全区8岁至15岁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设置初赛、决赛、研学实践等环节。参赛青少年围绕长征历史、闽宁协作等创作宣讲内容，优胜选手将赴福建古田、长汀等地研学，优秀者受聘为全市红色场馆志愿讲解员。

此外，9月份《红旗漫卷六盘山》专题展览将赴福建巡展，实现红色展览双向流动。两地还将联合开发红色文创宣教产品，搭建闽宁红色资源共享平台，以青少年思政教育为抓手，促进古田会议精神与长征精神交融传播，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刘媛）

「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系列主题活动举办

北欧深海的青花遗迹

海风带着咸腥气掠过奥斯陆港，海浪轻拍着海岸。挪威海事博物馆临海而建。

在馆内一处砖墙环绕的展厅中央，几件不久前从600米深海打捞上来的瓷器杯盘、玻璃残片等文物展品被分别浸在装有淡水的透明盒中，进行脱盐保护。展柜说明以挪威语和英语介绍“来自深海的瓷器沉船”，不时有参观者俯下身，凑近观察这些在水下沉睡数百年的展品。

挪威文化遗产局日前宣布，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了一艘载有大批中国瓷器的18世纪商船。那方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认为这一令人惊叹的深海考古发现呈现了中国瓷器走向欧洲、融入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历史轨迹。

展厅左侧，投影正循环播放遥控水下机器人在海底作业的影像，画面中可见沉船周围散落的白色瓷器和货物。据挪威海事博物馆“瓷器沉船”项目负责人弗罗泽·克瓦勒介绍，初步研究显示，“瓷器沉船”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船长约22米，可能是一艘圆艏、双桅加利奥特商船，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欧商船。

克瓦勒告诉记者，这艘沉船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的保存状态优良，文物完整性及质量俱佳；其次，货物构成特殊，中国瓷器、北欧玻璃器、枝形吊灯、谷物、纺织品等同时出现；再次，大部分货物仍装在船内的桶和箱子中，这意味着研究人员不仅可以研究单件文物，还可以研究18世纪商船货物的组织和装载方式。此外，沉船深度也使这一项目意义重大，北欧地区国家从未在这样的深度进行考古作业。

目前，与“瓷器沉船”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仍待解答：这艘船从哪里来？驶往何处？为何沉没？船上人员是否生还？克瓦勒说，由于这艘船似乎载有贵重货物，关于其损失的情况可能有历史记录。目前，研究人员正在查找通行税记录、保险档案等历史资料，希望能获取更多消息。

此次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瓷器，这批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其中一些属于巴达维亚瓷，另有部分器物可能属于德化白瓷。挪威东方陶瓷协会资深会员克努特·米雷尔研究中国瓷器数十年。在展柜前，他指着其中一些杯盘向记者解释其纹样、釉色和外销瓷特征。米雷尔告诉记者，这些瓷器看起来是面向欧洲市场的典型中国外销瓷，年代大约在1745年至1760年之间。

在对记者拍摄的相关图片仔细研究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表示，这批出水青花瓷器的风格与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中的清代乾隆早期标本相近，“例如，内青花外紫釉敞口浅曲腹圈足盘，在造型尺寸、折枝花卉纹样画法、青花发色以及瓷胎瓷釉等方面几乎如出一辙”。翁彦俊还介绍说，巴达维亚瓷是欧洲国家在景德镇定制的大宗外销瓷，青花紫釉小盘小碗的搭配多用于饮用咖啡和茶。

关于航行线路，克瓦勒和米雷尔都认为，“瓷器沉船”并非直接从中国驶来。他们推断，这些瓷器可能先经历了绕道南非好望角的漫长航程才抵达欧洲，然后在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或哥德堡等港口换船，再被运往更北的地区。

对此，翁彦俊的看法相似。他表示，瓷器运输很可能是“接力”完成，其在中国的始发港口可能是广州、宁波或厦门。

在米雷尔看来，此次考古发现反映出18世纪中国瓷器的全球影响力。他说，中国瓷器在出口欧洲的最初阶段，主要面向上层社会，但18世纪初以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城镇居民也逐渐能买得起中国的外销瓷器。

从6月开始，从“瓷器沉船”中发掘的部分文物在挪威海事博物馆展出。博物馆正在制订计划，在未来几年进行全面发掘。挪威海事博物馆研究与文化遗产管理负责人斯文·阿伦斯表示，团队希望获得更多可向公众展示的文物，并期待未来有机会与中国专家开展合作。（据新华社）



原州区籍知名版画艺术家王维德向宁夏美术馆捐赠200余幅精品版画

本报讯（记者 郝婧）近日，原州区籍知名版画艺术家王维德向宁夏美术馆无偿捐赠200余幅个人精品版画作品。

王维德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固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是宁夏南部极具代表性的版画艺术家。从艺数十年间，他深耕黄土高原这片热土，始终立足宁夏本土地域特色开展艺术创作。其版画作品以塞上山川风光、乡土民俗风情、城乡时代变迁为核心题材，画风质朴厚重、笔触凝练真切，

生动刻画了宁夏大地的人文风貌与发展轨迹，既拥有纯粹且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也留存了珍贵的地方文史记忆，是宁夏本土版画艺术创作的优质成果。

此次大规模精品作品捐赠，极大丰富了宁夏美术馆本土版画馆藏，进一步补齐、完善了宁夏当代版画艺术馆藏体系，为区域美术史料整理、艺术学术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物支撑。

这批捐赠作品纳入馆藏后，宁夏美术馆将完

成规范化建档、专业化妥善保存，并对作品开展系统性梳理与深度研究。后续场馆将通过专题展览、公共美育推广、艺术成果普及等多元化形式活化利用藏品，让扎根宁夏乡土的优秀版画艺术走出馆藏、走近大众。此次公益捐赠，不仅展现了本土文艺工作者深耕艺术、回馈家乡的初心情怀，更有力夯实了宁夏美术馆馆藏资源根基，为传承延续宁夏本土艺术文脉、推动区域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力量。

飞针走线挑花开

银针飞舞，彩线穿梭，不打底稿，无需草图，一幅幅山川凤鸟、瑞兽花鸟，便可随心所欲于指尖的起落游走中，揉进细密针脚，铺展成画。

这是一项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花瑶妇女中世代延续的传统手工技艺——挑花。

挑花的起源可追溯至汉代，明清后成熟，以独特的“清纱”针法（俗称“数针法”，靠数纱定位、十字交叉针法成型）用五彩丝线于青色土布上即兴完成。挑花双面而成，正面图案规整，背面线条整齐，工艺精密，即便是一件普通的完整筒裙挑花，也往往多达数十万针，需数月甚至数年方可完工。2006年，隆回花瑶挑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的村落间，心灵手巧的花瑶妇女或独坐屋檐下、或三五成群聚在草坪上、山林中，于欢声笑语里、飞针走线间，将她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期许编织在筒裙、头巾或腰带上，挑出花开，也挑出她们独特的浪漫与诗意。上世纪80年代，民间

文化摄影家刘启后曾携带花瑶挑花实物拜访沈从文，沈从文称之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

因花瑶没有文字，挑花就成为记录历史变迁和生活习俗的载体，所以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每个图案都有它背后的故事，不仅美观，更是心灵的寄托。”在挑花技艺传习所，隆回县花瑶挑花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沈燕希在展示挑花技艺时说道。

这是美丽花瑶独特的民族精神图谱，千年不断的指尖史诗。

花瑶挑花技艺历经千年沉淀与演变，风格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纹样配色迭代革新，更适配当代大众的审美。近年来，隆回依托山野文旅、数字化保护、非遗进校园等多维发力，全方位赋能挑花传承创新，使得原本扎根于花瑶木楼里的传统技艺，走出深山，走向世界。

一针一线、一丝一缕，优秀的传统文化终会千年延续、永不断绝。新华社发



▲6月23日，一些花瑶女子在挑花技艺培训班上交流。

▲6月24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的学生在学习挑花。